

唐代党项

周伟洲 著

隋唐历史文化丛书

唐代党项

周伟洲 著

2.232
59

三秦出版社

22.232
359

唐代竞项

周伟洲 著



三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西安

59764

《隋唐历史文化丛书》

编委会主任：宁 可 沙 知

责任编辑：张玉良 胡 戟

唐代党项

周伟洲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5.5印张 3 插页 10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46-065-5/K·27 定价：2.40元

《隋唐历史文化丛书》

序

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隋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均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研究隋唐时代的社会文化，对丰富人民群众的历史知识，给人民群众以历史反思，历史借鉴，将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陶冶情操，进而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力量。为了开发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对古代社会各方面的研究，繁荣学术，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联系起来，使学术研究成果直接介入现实生活，裨有助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我们组织编辑了《隋唐历史文化丛书》。

这是一套大型断代历史文化丛书，以学术性为主，兼有知识性。选题包罗隋唐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有研究价值的各个方面。一本书将具体地阐述隋唐时期的一个专题。体裁包括学术专著、传记、资料和工具书，尽量配图，做到图文并茂。尽可能使其成为历史、考古、方志、古典文学、民俗、经济史、科技史等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同时又能为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历史提供一套生动的读物。我们将为此而努力奋斗。

丛书共约一百余本，计划八年出齐，由中国唐史学会编，宁可、沙知教授任编委会主任，张玉良、胡戟任责任主编，负责丛书的组织和统稿工作。热切盼望隋唐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大力支持和批评指导，以求把这个事业办得更好。

张玉良 胡戟

1986年5月

前 言

我国古代的党项族，以其建立西夏政权和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西夏及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党项族早期历史及其与邻近诸族的关系，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价西夏及其文化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党项族的早期历史，主要经历了我国统一时期的唐代和分裂割据的五代；他们的活动对唐、五代的历史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唐五代史的组成部分。所以，无论从中国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等方面来看，研究唐五代时期的党项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是，关于唐五代时期党项史的研究，过去国内学术界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韩荫晟先生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先生的《党项古代史研究》（1972年东洋史研究会），前者主要是资料汇编，而后者虽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鉴于此，作者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上述韩荫晟、冈崎精郎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写下了这本《唐代党项》，大胆地发表了一些不够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广大读者。

周伟洲

1987、6、6



图一：唐夏州城遗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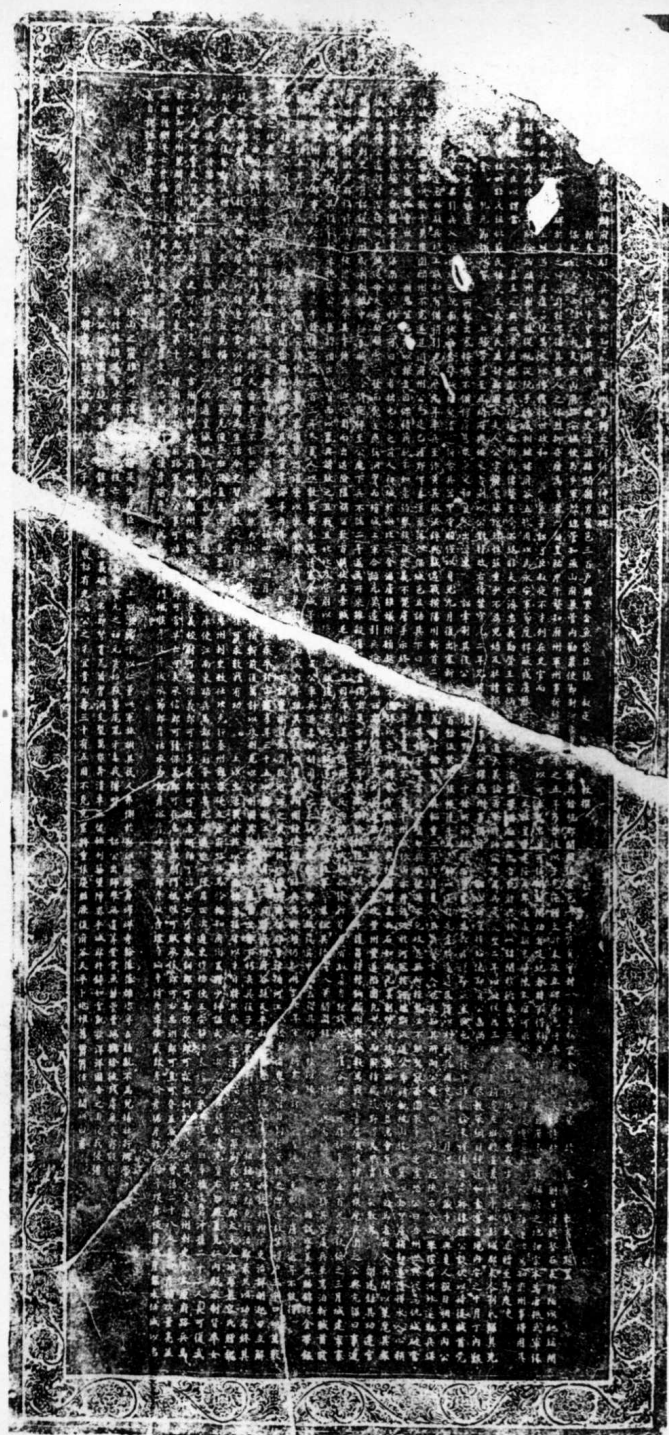
图二：唐夏州城遗址之二

[illegible]

图四：后唐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函

(抄件, 敦煌伯希和编号2992背面)

图三：折继冈神道碑



目 录

前言	(1)
一 绪论	(1)
1、党项的族源及原分布地	(1)
2、党项拓拔氏的族属问题	(7)
3、初期党项的社会组织及习俗	(14)
4、早期党项与吐谷浑、隋朝的关系	(16)
二 唐初党项的降附及党项诸羁縻府州的建立	(19)
1、唐初对党项的招抚及诸羁縻府州的建立	(19)
2、唐贞观九年前后的党项诸部	(24)
三 唐代党项的内徙与分布	(27)
1、党项内徙的时间及情况	(27)
2、党项内徙后的分布及活动	(39)
3、唐安史之乱后党项第二次大迁徙	(44)
四 唐朝中、后期党项的状况	(52)
1、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政策	(52)
2、内徙党项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	(59)
3、唐边将的暴虐及党项的反抗	(63)
五 唐末党项拓拔部的崛起及其割据势力的形成	(77)
1、党项拓拔部的崛起——定难军节度使的建立	(77)
2、藩镇交争中的定难军节度	(85)
六 五代时期的党项	(95)
1、五代时党项概说	(95)
2、夏州节度使李氏割据势力的发展	(107)

3、西路党项和中西交通·····	(118)
4、麟、府等地的党项折氏·····	(134)
附录一 唐五代党项拓拔部李氏世系表·····	(142)
附录二 五代党项府州折氏世系表·····	(143)
附录三 索引·····	(144)
1、2、夏州城遗址(统万城)	
3、《折继闵神道碑》	
4、《后唐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书》(抄件, 伯希和编号2992背面)	

一 绪论

1、党项的族源及原分布地

中国史籍中有党项专传的是唐魏徵等撰的《隋书》，唐李延寿所撰《北史》，杜佑的《通典》中也立有《党项传》。五代、北宋时修纂的《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元代所修的《宋史》等，都有党项专传。这些重要的史籍，或直接称党项为“党项羌”，或记其源于“三苗之后”，或云“汉西羌之别种（或‘遗种’）也”。所谓“三苗之后”，乃因汉代史籍称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①。总之，史籍所记党项是源于羌。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等还记述了汉魏以来西羌与党项的关系，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汉代的西羌主要居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②析支，即指今青海河曲一带，这里是羌族发源之地。党项既然在古析支之地，从分布的中心来看，他是与西羌同源的。西羌早在汉代就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一带。而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则为原属东北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所统治。只是在

①《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

吐谷浑的东边有两个羌族所建的小政权，即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和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这两个小政权事实上也是附属于吐谷浑的^①。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西魏逐吐谷浑势力出邓至，于此设邓宁郡（邓州），邓至亡。宕昌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年）为周大将田弘击灭，后于此设宕州。宕昌、邓至灭亡后，“党项始强”。以后，宕昌、邓至有一部分则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故《隋书·党项传》云“其种有宕昌、白狼（即白兰羌）”^②。因此可以说，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极广，《隋书·党项传》说：“东接临洮（治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传》则说：“其界东至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后者大约是唐代人进一步了解党项羌及其分布后，所作的叙述，因而较为全面和准确。

党项东边邻唐松州，隋时此地属同昌郡，“西接叶护”，此“叶护”，过去中外学者均认为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如果泛指隋及唐初吐谷浑统治的部分党项羌以西之地而言，这一说法似乎还可成立。因为当时吐谷浑的西境一直达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与在西域称雄的西突厥相邻。若仅指党项羌而言，则不够确切，因当时党项各部在吐谷浑之南，西边仅达黄河河曲一带。党项的南部与春桑（一作“春桑”）、迷桑等羌杂处，春桑、迷桑地当在今青海、四川交界处，今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

①详论论述见拙作《吐谷浑史》第61——62，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②关于白狼即白兰的考证，参见黄颢等《白兰考》，载《青海民院学报》1983年2期。

据有的学者研究，“桑”本为藏语 gzing，意为草地、牧场，有水草之地。春桑即春天放牧的地方。至今青海的果洛、四川的阿坝地区，仍有“春桑”、“冬桑”、“墨桑”、“申桑”等地名^①。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亦记：附国西的女国（即西女国，地在今西藏北部），“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碛，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春桑、迷桑居地的叙述与前相合，在党项之南。“婢药”，亦即“弥药”（minyag），是吐蕃对党项的称呼。其余皆羌族部落名，地在今青海东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又1908年至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Л.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盗掘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些西夏文诗歌、谚语。其中有一首诗是颂扬党项人祖先的。现据陈炳应同志从俄文译释的有关段落，抄录如下：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②

据中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红脸”（或译作“赭面”）指党项族，其祖坟在“白河上”。白河系指其发源之地，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古称“白水”）。“弥药”是党项人自称，以后吐蕃沿用此名^③。也有的学者认为：西夏党项羌人所称的“白河上国”的意思是“上（尊尚）白”，西方属金，金是白色的，由于尚白

①李范文《党项原始居地考》，1982年银川西夏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西夏文物研究》第346页，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如参历山（Н. А. Левский）《西夏语文学》，1960年莫斯科；罗福成《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载《西夏文专号》；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等。

而命名为“白上国”^①。从上引西夏诗句来看，前一解释较胜。这也证明党项羌的原分布地是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隋书·党项传》还记：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旧唐书·党项传》则说：“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后者所记数字较前大，可能是从隋代到唐初，其每个部落内人户增加了的原故^②。《旧唐书·党项传》等还记载了八个以姓氏为部名的部落，即“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通典》作‘野律氏’）^③、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八部的居地，史籍阙载。据近人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说：“自吐蕃入侵党项，诸姓内徙，诸部旧称尚有留作地名以至于今日者”，据他考证：

拓拔氏：“位于洮、岷西南一度设置叠州之‘叠布’（今甘肃迭部），以至松州西北甘松故地之‘铁巴’诸部，皆为‘拓拔’部之转音。”又《新唐书·党项传》记贞观九年李靖等击吐谷浑，有党项大酋拓拔赤辞屯狼道峡（《旧唐书》作狼道坡）以抗唐军，“狼道坡故址，盖即今下叠部东界之罗达（今译作‘拉达’）”。

房当氏：“‘厓（房）当’故址，即今临潭县西拉力关西仓土官辖境之西塘。”

细封氏：“‘细封’故址，当今拉卜楞郭莽寺所属安睹六族中之细华，藏语之转称细华，盖目此为多雹之地。”

米擒氏：“‘米擒’当即《宋书》之昂城，亦即《唐书》中之误为‘昂城’者。其故址为今松潘境西北大金川上游细华以南陌昌（今阿坝）地方。”

把利氏：“‘把利’故址当为今夏河西南洮河北岸之薄拉地

①吴天墀：《西夏史稿》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增订本等。

②参见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第11页。

③野辞氏或野律氏，疑即史籍中记党项大姓野利氏，律、利一音之转。

方。”

颇超氏：“‘颇超’故址当即今果洛西南近色达处柏华昌地方。”

野辞氏：“‘野辞’故址当为今果洛贡马昌属境黄河岸之蛙色尔地方。”^①

吴氏考证的党项七部居地，除拓拔氏部居地考证有一些根据外，其余六部均系推测，难以尽信。但其推测的党项七部居地，皆在史籍所述党项原居地范围之内，大的方位是正确的。

除了上述党项八部外，两《唐书·党项传》还记载了两个大的党项部落：黑党项和雪山党项。

黑党项 《旧唐书·党项传》说：“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王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关于黑党项的“黑”字，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引白鸟库吉《室韦考》等对黑黠戛、白黠戛，黑匈奴、白匈奴的解释，认为“白”是指比较文明的部落，“黑”即与“白”对应，指比较野蛮的部落，在党项族中受尊重的部族往往加上“黑”的称呼。他又引西田龙雄的说法，即弥药一词本身就有“黑党项”之意；作为党项中心的黑党项，在《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圣宗三十四部”之一西南路招讨司所辖的“鹤刺唐古（喀刺唐古，黑党项之意）”中得以承续^②。至于黑党项的居地，是“在于赤水之西”。此赤水，冈崎精郎以为即吐谷浑赤水（今青海共和）^③，此说近似。按上引《旧唐书·党项传》说，“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而贞观九年李靖北路军李大亮等追击伏允，曾至“河源”，此河源应为隋炀帝灭吐谷浑后所设之河源郡（治赤水，今青海兴海），则黑党项居地当在今青

①见《西陲史地研究》第21—22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

②见《党项古代史研究》第28—29页。

③同上书，第28页。

海兴海县以西之地①。

雪山党项 《旧唐书·党项传》记：“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认为，雪山党项是由其住地名雪山而命名，此说是。但他考证此雪山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松州嘉诚县（今四川松潘）所记，在县东八十里之雪山，此说则误。后作者在《党项古代史研究》中，仍然坚持此说；同时也注意到雪山党项破丑氏，唐代史籍又称其为“河西党项”②；如此则雪山党项居地在河西九曲。其实，雪山党项破丑氏居地应在河西，即河曲西；所谓“雪山”，决非指松州之雪山，而是指河西之大积石山。雪山，非专名，唐时祁连山、岷山等因终年积雪，均有时称为雪山，大积石山当亦无例外。

关于党项的名称问题，过去中外学者讨论甚多，大致有以下几点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党项”一词，是内地汉族对他的称谓；北方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这在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文可以找到证明③。唐古特（唐古）应即党项的异译，即是说北方民族是沿用了内地汉族的称呼。藏族（吐蕃）称党项为“弥药”（Minyag），汉、藏史籍均有明确记载。至于党项人自称，据有的学者推测，可能与藏族人对他们的称呼相同，称为“弥药”或“弥人”。前引西夏文诗歌有“高弥药国在彼方”一句，似乎西夏人（党项）确自称为“弥药”。

“党项”一词的原意，中外研究者的看法分歧很大。如丁绣认为，“党、宕音近，藏语‘党’谓高寒平旷之地，‘昌’一作‘项’，意亦为荒野或二水之交，故谓‘党项’即‘宕昌’”。吴景敖不同意丁绣党项即宕昌之说，但未释“党项”的原意④。

①参见拙著《吐谷浑史》第90页。

②《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

③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914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④以上均见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第20页。

上引王静如先生《西夏国号考》，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之为“党项”（唐古特）。日本寺本婉雅认为“党项”有“广大草原”之意，是藏语“Thañ-Skud”的对音（《西藏古代民族之研究下》，载《支那佛教史学》1卷3号）；青木文教则认为藏语“T'angrgot”有野蛮人的原野的意思，指西藏高原的游牧地区，是否以此来为党项命名，则不得而知（《西藏文化之新研究》）^①。而冈崎精郎在其《党项古代史研究》一书中，则引西田龙雄的说法，以党项自称“弥药”有“黑色的党项”之意。以上诸家的说法，均可备一说，要取得一致的、正确的结论，看来还须进一步研讨。

2、党项拓跋氏的族属问题

党项既然是汉魏的西羌发展而来，那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原西羌诸部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又杂入了其它民族成份呢？魏晋以来，东北和北方的鲜卑族曾大量向西北迁徙，著名的就有河西鲜卑（以秃发鲜卑为主）、陇西鲜卑（以乞伏鲜卑为主）、吐谷浑、折掘等。特别是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的吐谷浑，于晋永嘉末（312—313年）西迁至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统治了该地羌、氐等族，时间长达三百余年。其间，吐谷浑与党项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西北的羌族（包括党项羌）受到原北方鲜卑族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是党项八部中最强的拓跋氏，与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后改元氏），字音相同，两者是否同源？也就是说，党项拓跋氏是否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而非源于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一个难解之谜。从唐代以来，中国史籍就有不同的记载，

^①转见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载《东方史论丛》第一卷，莽德社，昭和二十二年。

到党项拓拔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正式提出自己出于元魏拓跋氏之后，使问题更为复杂。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两种意见争鸣不已，谁也说服不了谁。下面我们对近几年双方主要论点作一简介，并表示一些看法。

(1) 关于文献的记载问题。前引中国史籍关于党项专传及一般论述中，均云党项出自羌，其中自然包括党项拓拔氏在内。但也有些史籍记载党项拓拔氏出自元魏拓跋鲜卑的。这类史籍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时间稍后，且出自西夏统治者拓拔氏之手的。如《宋史·夏国传上》元昊上宋朝表、《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一月西夏使贺九言致宋书中语、《金史·夏国传》的《夏国谱系·序》等。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认为，这些记载均出自西夏统治者之口，有“冒认”和“高攀”之嫌，有以此来证明西夏立国的合法性的用意，不足为据。就是认为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的同志，也认为说西夏统治者没有“冒认”、“高攀”的必要的看法，是不合乎事实的。另一类史籍是时代较早，或出自西夏人以外其他族之手的。如汤开建同志最近发表的《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①一文中，就列举了数种：

首先是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一〇“拓跋”条，将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谱系直接与党项拓拔氏的联系在一起，且称党项拓拔氏为“东北蕃”。这条资料出自唐代，时间较早，而且是汉族所纂姓氏著作，自然有它的权威性。但是，正如陈炳应同志所说：

“第一，据《元和姓纂校勘记》的考证，此书早已亡佚，是孙季逵从《永乐大典》和其它文献中钩沉补辑的。而且，林宝成书过于匆忙，孙季逵的校录时间更为紧迫，所以书中错误很多。第二，说到西夏族源问题的最早的史籍都说党项是羌族，并未提到有鲜卑族混入。”“第三，‘拓拔’之名并非鲜卑族所独有。在唐代初期，今西藏地区就居住着自称‘达布’的少数民族。今甘肃、

^①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